

內部材料 注意保存

苏、捷、匈、保、波等国家社会經濟 情况的若干資料

(供討論參考)

一九六三年十月

112

31



数据加载失败，请稍后重试！



数据加载失败，请稍后重试！



数据加载失败，请稍后重试！

A19727



目 录

一、资本主义复辟活动的情况.....	1
1. 资产阶级分子开设私营工厂、贸易公司和饭馆，在国营商店中做私人买卖，从中剥削雇工、投机倒把、牟取暴利，政府对私人企业的活动听之任之，甚至赞颂，定期发给营业许可证.....	1
2. 有的把集体农庄土地按同等数量固定给每个人，有的分卖公家的土地，有的把公有土地分给想要土地的人变为非集体农民的私人园地；农庄的大部分劳动力在搞自留地、副业等私人经济，有的还雇工耕种自留地，还有包工剥削、农庄领导人员侵吞集体农民的劳动果实和封建宗教复辟活动等现象，甚至公然解散合作社，变为“农业小组”或农民的独立庄园.....	12
3. 投机分子在莫斯科市场上感到很自由，市场价格常常由投机分子操纵，调整市场价格是不可能的，自发势力是有无限权力的主宰者.....	30
4. 国营企业领导人员营私舞弊，贪污盗窃大量国家资财，国家检察机关受贿庇护，使贪污分子逍遥自在.....	39
5. 对工资数目、劳动条件、居住条件不满，劳动力大量流动；他们除关心自己的物质享受外，对其他任何事物都不感兴趣.....	53
二、国民经济中的一些基本情况和存在问题.....	60
1. 苏联计划工作落后，工农业生产未完成计划的情况.....	60
2. 苏联基本建设投资分散与建设期限延长情况.....	66
3. 苏联工农业生产和比例失调的情况.....	68
4. 苏联企业中的本位主义情况.....	72
5. 苏联党员、干部和劳动力情况.....	74
6. 苏联援助印度和出售发明特许权的情况.....	75
7. 经济互助委员会的活动情况.....	76

8. 农业合作化情况.....	79
9. 波兰工农业生产、对外贸易情况.....	81
10. 捷克工农业生产情况.....	89
11. 匈牙利工农业生产情况.....	92

一、资本主义复辟活动的情况

1. 资产阶级分子开设私营工厂、贸易公司和旅馆，在国营商店中做私人买卖，从中剥削雇工、投机倒把、牟取暴利，政府对私人企业活动的流行听之任之，甚至赞颂，定期发给营业许可证。

去年9月“苏维埃俄罗斯报”上报了关于揭露一大批在列宁格勒贸易机构中活动的惯窃和骗子的消息。

这些罪犯在列宁格勒的一家工厂中制造一些自来水笔、纽扣、剃刀、直尺这些所谓“左面”商品。他们经过“自己的”人把这些商品销往一些城市的商店。

领导这一伙人的是波札里涅茨，前工厂生产主任。是他纠合了这伙人和进行舞弊。

罪犯们在5年中越来越无耻地干起来。……

……共有150本帐本。而每一页上都是卑鄙行为、欺骗、诡计。

这些骗子经手的钱约有200万卢布（旧币）。……罪犯们生活很阔绰。他们当中许多人有别墅、汽车，并在休养所住。

最近作出了判决。这就是那些侵占人民财产的人的必然结果。

（《苏维埃俄罗斯报》1963年2月21日）

恩·克鲁伯尼娜决心作个工厂主，但不是在美国、英国，而是在我们苏联，在列宁格勒。

大家都知道，一九一七年之后，在我们国家里已有没为工厂和工场主创造条件。克鲁伯尼娜决定自己来创造这些条件。她担着风险雇用了裁缝、压折工，建立了地下公司“克鲁伯尼娜公司”，生产和销售尼龙女上衣。

这个公司的代理人来往于列宁格勒各百货商店，拉住妇女们的手，高兴地低声说：“太太，进口货，最时髦的！”

公司女主人每天的收入是七百新卢布。女厂主创造了这样的“经济奇迹”之后，却

宁願隱蔽起来。她不让记者照相，也不向记者发表谈话。

但是今天我们有机会刊登了她的相片，供大家欣赏。請瞧瞧这位苏联女资本家。

(苏《消息报》1963年4月9日刊《地下工厂主》，
见1963年8月24日《人民日报》)

我請求刊登随信所附的一张相片。这张相片上的看起来十分有礼貌的规规矩矩的一家子，同刊登在七月二十七日《文学报》上的格·拉多夫的文章《走旁门外道》直接有关。一位库班老人憤怒地向作者叙述的正是关于这一家子的事情。

在这张照片上(自右至左)的下排是家长伊凡费多罗维奇·卡麦涅夫，女婿阿·姆·德米特里耶夫，上排是娜杰日达·叶菲莫夫娜·卡麦涅娃和她的女儿柳德米拉。

因为我们最近几个月有机会详细地研究了这一贪心的小家族的活动，所以請允许详细地谈谈这一家族。

一九六〇年四、五月间，卡麦涅夫夫妇同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卡涅夫区的四个集体农庄签订了在卢于斯克州的城市市場上推销农产品的合同，讲好的条件是周转一次取利百分之二。集体农庄究竟有多少錢被直接窃取，这位在库班和顿巴斯以浑名“涅莉”和“让娜”出名的女奸商卡麦涅娃却秘而不宣。

在一九六〇年到一九六二年期间，经过他们的手的集体农庄的产品，价值达六十万卢布以上(新币)。卡麦涅夫一家从集体农庄取来并在市場上卖掉的计有：葵花子二十四万五千三百九十四公斤，小麦十一万三千一百四十五公斤，面粉一万四千零八十三公斤，水果二十七万五千六百七十五公斤，蔬菜四万五千一百五十七公斤，猪四千七百四十九头和许多其他产品。

卡麦涅娃領導了“公司”。丈夫，女儿和女婿在她的指点下行事。公司的头儿考虑到买卖的规模，还雇佣了十二名售貨員(其中三名是屠夫)和两名搬运夫。这些售貨員和搬运夫连休息日也沒有，白天黑夜连着干。

在两年半的时间內，卡麦涅夫家的“贸易公司”从集体农庄得到了一万二千五百卢布的报酬。但这些贪心的市侩开始干这种勾当岂只是为了成千的卢布！

走向发财的道路是简单的。集农体庄的产品是按一种价格出售的，但在交给集农体庄的帐单上，“商人们”却写的是降低了的价格。就靠着这种笨拙的手法，从“列宁之路”集体农庄的出纳处窃取了二千八百九十七卢布，从列宁集体农庄窃取了二万零八百

三十八卢布，从“曙光”集体农庄窃取了八千九百三十三卢布。加里宁集体农庄在侦查员和检查员帮助下，审查了自己的财政经济活动之后，向卡麦涅娃提出了数目达一万二千六百八十六卢布的诉讼。受害的还有“胜利”集体农庄。从这个农庄的出纳处被窃取的钱比从列宁集体农庄和加里宁集体农庄窃取的钱还多。

卡麦涅夫一家在戈摩纳尔斯克郊区盖了第二幢房子，购置了地毯、电视机、冰箱和时髦的家具。仅仅在戈摩纳尔斯克的汽车检查处就登记了五辆小汽车，这些汽车是伊凡诺夫·卡麦涅夫在不同的时间内买进卖出的。

最后，正像城里人们称卡麦涅娃那样，“市场的王妃”入狱了，她的丈夫在等刻审讯期间不得不下矿井工作。

噢，你们会问，库班的集体农庄同卡麦涅夫一家坏蛋勾搭在一起意味着什么？

卡麦涅夫家的“公司”利用戈摩纳尔斯克市苏维埃前主席伊凡诺夫、卢干斯克州执委会前副主席托克马科夫和其他领导工作人员对他们的庇护，在库班收购和提供了矿渣砖、屋顶用铁皮、窗用玻璃、水泥、电线、水管、瓷砖、胶合板和其他材料，这些材料都是正在建设的集体农庄感到十分需要的。

我们完全同意文章的作者：现在已经是对国家机构和集体农庄间的“商业中间人”宣布无情的战争的时候了，已经是吸引广大的社会群众同懒汉和盗窃者进行斗争的时候了。

苏联《文学报》七月二十七日在作家札记栏内刊载了拉多夫的题为《走旁门外道》的文章，这篇文章中有关卡麦涅夫一家部分的全文如下：

我了解库班的卡涅夫区的一些农庄，同卡涅夫著名的家禽饲养员见过面，他们名扬全国。我听到过很多关于卡涅夫能干而有主动精神的领导人的传说。可是，当你突然听到，卡涅夫创造出来的一部分，而且是不小一部分收入，几年来一直落到新生的富农、“生意人”卡麦涅夫的腰包的时候，怎能不痛心，怎能不气愤呢。他们，卡麦涅夫夫妇干了些什么呢？他们算作卡涅夫的“农庄庄员”，但是却住在顿巴斯，并且有自己的经理机构。上千头的猪、数百公担粮食、数百吨水果和葡萄经过他们的手从卡涅夫的各农庄运到工人住宅区的市场上去。偷盗来的成千上万的矿渣砖、成车厢的玻璃、屋顶用铁皮、水泥等等……也经过这些“中间人”从顿巴斯运到卡涅夫。

他们就是寄生虫、富农、剥削者，在每件“不得罪人”的交易后面都有私有者。一位上了年纪的库班人向我讲述了卡麦涅夫家的“托辣斯”之后，以压抑的愤怒作出结论

说：“我们在培植坏蛋！”

是啊，如果我们允许形形色色的代理人、“木材采购者”、掮客、中间人和运货人围着集体农庄死转，就是在培植坏蛋；如果等待他们自己“被捕”，并把我们的人拖进监狱，就是在培植坏蛋；如果不是对私有企业主宣布进行广泛的社会围捕，而是等待的话，那就是在培植坏蛋。

（苏《文学报》1963年8月17日刊读者宾丘克少校的来信，见1963年8月29日《人民日报》）

通讯写道：“在奥伦堡州的城市和区中心至今还存在着数以百计的所谓旅店和栈房。其中包括运往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各种货物转运点，以及去城市逛市场或办理别的事情的集体农民和国营农场的工人留宿的住所。这是些私人‘旅馆’，它们的老板从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方面收入不小一笔钱。”

通讯举例说，叶菲姆·尤金就是这种老板。“他住在奥伦堡市，然而却每月从‘马格尼托斯特洛伊’国营农场拿八十卢布工资。钱虽然不少，但是还不能靠它发家。于是尤金在乌拉尔河畔大街建筑了一幢两层楼的私人住宅，而只把六十六平方米的第二层登了记。

“‘第一层不是住人的。’他解释说，虽然‘不住人的’房间却摆着家具。这里是供由国营农场来的人留宿的。”

通讯写道：“奥伦堡市的每个‘旅店’几乎都是双层的私宅。接待由萨拉克塔什区来的旅客的高尔科夫兄弟的两幢楼就是这样的。通常这些私人旅馆都用很高的围墙围起来，安着大扇的铁门，上面挂着一块触目惊心的牌子‘小心恶犬’。”

这位记者写道：“在奥伦堡市大约有五十所公开的和隐蔽的旅店。在布祖卢克、奥尔斯克、索罗琴斯克等城市这样的旅店也不少。而且某些集体农庄竟以合法化的形式向房主交大笔金钱。布祖卢克管理局的列宁集体农庄维持三家旅店，并向店主各交六十五卢布。这个管理局的斯维尔德洛夫集体农庄庄员留宿的旅店的老板每年从每个庄员家庭收六卢布和十普特小麦。”

“集体农庄和国家的钱源源不断地流入旅店经营者的腰包，寄生虫正在奥伦堡孳生。没有人去制止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领导人，并要他们负责。州执行委员会不止一次地作出关闭旅店和栈房的决定。但是这些决定只是一纸空文。在州执委会的一项决议

中指出，仅在奥伦堡市，十七个栈房就要国营农场每年付出五千七百三十七卢布，在奥尔斯克市，要付出四千七百卢布。全州共要付出一万五千卢布（实物支付不算在内）。自那以来已过去许多时间了，但是私人旅馆仍然生意兴隆。”“一年前奥伦堡市执行委员会作出的决定也无济于事。这项决定提出在八月一日以前关闭私人旅店。在附件中开列了三十个这样的旅店。但是在这以后，奥伦堡的私人旅馆数目却增到了四十六个。”

这位记者指出，“旅店是社会健壮躯体上的一个毒瘤，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地方党和苏维埃机关的领导人很清楚地了解这一点。但是光了解还太少，必须采取行动。”

通讯接着写道：“不幸的是，没有一个州执委会和市执委会的决议中提到用什么来代替旅店。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每天收到数以百吨计的各种货物，这些货物不总是能够立即从铁路车站运回的。在货站上成立的国营农场间的货物装卸点可以减轻这个任务，但是只能减轻一半。在道路泥泞季节或冬天只能乘拖拉机去某些乡村。因此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不得不把要运的货物存放在私人的栈房里。去城市的村民在私人旅店投宿不是自愿的。不知在什么时候建造奥伦堡唯一的所谓‘农民之家’还容纳不下旅客的十分之一。而且不是每个庄员都愿意在这里逗留。‘农民之家’没有保存村民运往市场出售的货物的仓库。”

（苏《农村生活报》1963年7月17日刊该报记者马伏留别尔基诺夫写的通讯，见1963年8月7日《人民日报》）

《真理报》在八月三日发表一篇以《疗养城市的生意和寄生虫》为题的文章说，在苏联黑海海边，“人民疗养院、休养所和公共饮食企业逐年增多。但是仍然不够。这种情况被不诚实的人、爱发横财的人、生意人和贪财的人所利用。他们对休养者敲竹杠，拿住房、水果、鲜花、疗养地的纪念品进行投机。

“在疗养城市进行活动的生意人在给休养者出租房屋方面获得的收入特别大。例如去年，在索契、雅尔塔、高加索的几个矿泉以及阿布哈兹一些沿海城市的居民，在给休养者提供成套住宅、房间和床位方面，收入了好几千万卢布。只有一小笔钱是按照合同、经过住宅介绍所和其他机构在合法基础上付出的。而大量的钱却进入了房东的腰包，他们利用地方当局的放任和宽容，回避法律，把自己的房子当作大量非劳动收入的固定来源。”

这篇文章说，据检查，“疗养城市的地方苏维埃的执行委员会、行政机关和社会组织实质上沒有同不劳而获的寄生分子进行斗争，有时以调和主义的态度对待各种反社会的表现，对私人企业活动的流行和贪财勒索的行为听之任之，这引起劳动人民的合理愤慨。”

文章说，“苏共索契市委和市执行委员会有人说，市内这些被查出来的寄生虫已经全部作了劳动安排，或者根据各种原因离开了城市。实际上，据查明，仅仅在市内两个区，就有将近一千八百个身体健康的有劳动力的人沒有参加社会公益劳动。在基斯洛沃茨克、皮亚季戈尔斯克、加格拉、古达乌塔、苏呼米和维尔塔等地，都有不少寄生虫，市执行委员会采取的使他们参加公益劳动的措施是十分不够的。”

文章说，“为了追求暴利，许多拥有房子的游手好闲者，不仅把房间、凉台和小室租给人住，甚至把板棚和大树下的床位也租出去。

“发财迷也传染了某些住在机关宿舍和公寓中的公民。他们也把房间、小室和床位租给休养者，通过这种办法可以赚到他自已所付房租的十倍到十五倍的钱。”

“利用地方当局机关的眼光短浅和放任姑息，一些不诚实的人非法扩大自己的‘领地’，任意占据土地，逃避现行规则而建造各种建筑物。仅在最近几年，通过这种方式，在皮亚季戈尔斯克建造了二百六十幢房屋，在埃森图基造了一百七十二幢，在雅尔塔造了一百九十五幢，在阿卢什塔造了二百七十一幢。”

文章还谈到，“阿布哈兹的许多沿海城市中，可以看到在最近几年内由私人建造起来的漂亮的多间别墅，面积达一百五十至二百平方米。”这些房子的主人和商店分部主任、饭馆经理，市场货摊主任，市聋哑协会主席等等。文章说，“建造这些房屋的钱从投机而来，这不是什么大秘密。”

文章说，“苏呼米、加格拉和古达乌塔市苏维埃的委员会是否知道这一点呢？当然知道，它们装作积极工作的样子，开会，官僚主义的公文来来往往。在它们存在的全部时期中，沒有为沒收用非劳动收入获得的房屋做一件准备工作。”

文章还说，“疗养城市的某些居民利用商业机构的管理无能和财政机关的放任，靠私人企业活动和投机不受惩罚地发财致富。”“在高加索一些矿泉城市，拿鞋子、毯子、手工制的毛织品等进行投机的现象甚为流行。在阿布哈兹一些疗养区，许多居民专门从事制造和出售恰奇等酒类。”

六月十五日出版的《经济报》刊登该报记者的一篇文章说，在索契，“目前有几万

人在夏天还不得不向私人租房子。出租住宅的居民每年收入达一千二百万卢布，而几百万卢布却进入了阿布哈兹、阿扎尔和克里米亚房主的腰包！比这个数目多好几倍的钱，本来是可以作为国家的收入而不进私人的腰包的。还有不少这样的情况，勒索者和骗子手利用种种机会，依靠到这里来休养和治疗的人发财。

“涅勃拉特从一九四八年起是一个摆香烟摊的售货员，以后他经营一个收买瓶罐的小摊，工资为四十卢布。从一九五六年至一九六〇年，他总共有两年零八个月没有工作，他同两个孩子靠他的妻子——‘美食店’的售货员养活。而就在两年期间内，涅勃拉特一家盖起了一座面积为一百四十八平方米的私人住宅和作为汽车房和夏天厨房用的二楼楼房。

“切列基泽是一个更‘有办法的人’。他工资只有八十一九十卢布，一家三口人，竟能够盖起面积为一百六十四平方米的两层的大楼。这个市侩吸收麦尔加索娃作为造房同伙，并靠她的‘股金’建造房子。麦尔加索娃在发现欺骗和勒索行为以后，向法院提出控告，法院作出了裁决，要切列基泽偿还交给他的股金。人民法院工作人员（前法官冈恰罗夫和法院执行人员汉吉扬）没有拍卖这座用麦尔加索娃的资金建造的房子，而把它交由切列基泽自己处理。他当然没有放过利用这一意外的袒护行为，按投机价格出卖了四分之三的房子，支付给麦尔加索娃，偿付了诉讼费用和建筑银行的贷款。这时，他大约还剩有五千卢布、四分之一的房子——两间房、一间厨房、一个阳台和一间夏天厨房。”

文章说：“奇怪的事情是，在加格拉、苏呼米、甘季阿迪和其他地方，许多沿岸好地已为私人建筑者占用，他们在这些地方造了房子、厢房和凉棚。”

文章指出：“在寄生虫中，不仅有‘本地’居民，而且还有每年到黑海岸边来住几个月的骗子手。”

六月八日出版的苏联《经济报》刊登的一篇题为《冒名敲诈》的文章说：在莫斯科夏季，“到郊外去的百分之六十五的托儿所没有自己固定的避暑房子。它们通常是租赁私人的房子”。

文章说，“使人感到不明白：为什么国家组织——托儿所——竟同私人讲交易，付给他们房租呢？并且年复一年地付。

“为了安置在没有自己固定避暑房子的托儿所里成千上万的儿童，将要花费多少钱呢？这笔开支要达到二十万卢布！另外还要加上数万卢布所谓隐蔽的开支——花在修缮房屋、场地设施和不合理的运输开支上。”

文章说，“在伊利印斯基车站，房东尤尔科夫（共产主义街，六十六号）的房子，少于一千卢布不能出租，连一个戈比也不少，虽然去年只有七百五十卢布租金他就同意了。”

文章说，“还可以继续举出重利剥削者的名单。然而，值得一提吗？看来，在莫斯科格罗纳还有不少高价出租房子的房东的地址。不值得一提还因为，不是私人房东向国家组织提出建议，而是国家组织向他们提出开展‘业务’关系的建议的。养肥‘私人部分’的这种作法究竟什么时候才结束呢？”

文章说，“幼儿园通常是设在学校里面的。但是，一些学校校长的作法比那些冒名慈善家从事敲诈的房东并没有好多少。

“在这里举一个有代表性的例子。五年来，莫斯科无产者区四百九十二号幼儿园租了新耶路撒冷学校的校舍。幼儿园的行政部门在家长的帮助下，还在这里建造了厨房、盥洗室以及其他辅助房间。付了一千八百卢布的租金。今年，校长基利亚罗夫同志找到了更富裕的租借者——巴拉基廖夫纽扣工厂。这个工厂比区幼儿园能多付一千二百卢布。因此，现在在新耶路撒冷学校里安置了少先队。

“于是幼儿园去找巴尔维赫十一年制学校行政，而他们竟向我们索取七千五百卢布。在柳别尔策区日罗什基纳乡村里，总共有四个教室的学校就要租金五千卢布。

“而某些学校校长竟这样说：不喜欢——就别租！”

（见1963年8月12日《人民日报》）

“大富农——吸血鬼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而小富农还有时碰到。他们多么想翻身，想掐住自己亲人的脖子。……他们竭力慢慢地、悄悄地，带着天真的微笑（“哪有什么，——我完全是合法的！”）欺负人。”

作者说，罗斯托夫农业机器制造厂销售处工作人员戈林，就是这种“小吸血鬼”。他盖了一座60平方米的小屋子，自己不去住，却想靠小屋子赚点钱，正好建筑工人伊凡·安德烈耶维奇·布苏耶克一家人正忙着找房子。

“——你真可怜，可怜——戈林对他怜悯地说，——那你搬到我那里去住吧！”

过了一年，“恩人”的家里已经没有转身的地方了。

——这么办，——有一次戈林向房客说。——明天，星期天，大家一齐动手去建筑！

——建什么？

——建一个厢房。房子太挤了。

过了几年，继第一个厢房之后，又盖了第二个，第三个厢房。而主人，像个蚂蚁一样，不是往家里拖木板，就是拖铁板。邻居只是摇头：

——我们的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劲头大起来了。要建起一个小城镇哩！

‘小城镇’建起来了，房租也提高了。第一个厢房每月租金16卢布，第二个厢房33卢布，第三个厢房51卢布。”

一次，戈林因隐瞒收入被罚款，他却劝租户到法院去证明他是善良的，不要他们的任何报酬。作者说这种人是“在集体的旁边生活和发展着”的“吸血鬼，小富农”。

“……8个人走一个门。大家都在一个工厂工作。但是，7个人每月要从自己工资中付出100卢布，而一个人却把这笔钱装进了自己口袋。已装了很久，约10年了。

……

……戈林不是唯一的一个。我们还有许多患有骯脏病——贪财的人。他们为了满足自己的贪欲，什么诡计都施得出来。靠不劳而获的收入盖别墅，购置汽车。他们也不顾羞耻地当着邻居和公众的面干这些事。而邻居和公众往往缄口不言。似乎，把狡猾的吸血鬼从清水中淘出去，不是他们的责任。”

（苏《苏维埃俄罗斯》1963年1月20日刊卡卢金
《要谎价的恩人》）

保《工人事业日报》8月3日刊读者来信的全文是：“阿达纳斯·卡拉依德日耶夫10年多以来一直在普罗夫迪夫卡尔洛夫斯卡大街116号开私营电力呢绒洗染厂。他同时又是市的商业企业的领导人。这是什么品质？”

评论摘要如下：

我们和普罗夫迪夫市人民会议代表一起来到了给编辑部信件中所指出的地方。两层古老的楼房和一个宽敞的院落。在拉紧的数条绳子上，挂着晾干的白色长腰带、浅咖啡色和深咖啡色的呢子。从无人的院落的建筑物里，传来了呢绒洗染厂的机器轟隆声。是的，有多神奇，就在菲利波沃车站跟前——呢绒洗染厂！市人民会议机关知道这一点吗？不仅知道，而且甚至赞颂这个私营工业企业的存在。“地方工业和手工业”部一级经济学家拉什科·维列夫同志10年来定期发给这个私有者开办手工业的许可证。

维列夫同志替自己辯白说：“我们怎么办呢？我们过去关闭过这个厂子。市内沒有别家呢绒洗染厂，而工业联合企业又不願意接受这个工作。原是应该满足人们的 需求的”

我们不清楚促使维列夫同志将呢绒洗染厂保存在普罗夫迪夫工业区的是对人们的关怀，还是对私有者的关心。许多年来，特别是1944年9月9日之后，沒有看到田野村庄的农民穿过由洗染厂洗染过的家庭织的布所縫的衣服。正因为如此，洗染者需要远远地到遥远的普罗夫迪夫市以外找寻顾客。

我们好奇地同“工业家”会见。当我们走进靠着房子的遮棚时，阿达纳斯·卡拉依德日耶夫出现了。他虽已过中年，但非常健康和精神饱满。他拿出他的许可证、定期缴税的收据给我们看——一句话：“請看，我在国家面前是一个诚实的公民。”但是，有一点阿达纳斯·卡拉依德日耶夫不能给我们解释，即他作为一个私营手工业者，是怎样极端狡猾地攫取洗染职业的许可证的，同时又是怎样成为“市贸易”商业企业的工作人员的。

阿·卡拉依德日耶夫反驳我们说：“我是拿养老金的人，我有权从事手工业！”但是，他在今年7月15日才拿养老金，而在这之前从1949年以来，他就以他老婆的名字攫取许可证，而事实上是他自己确保“原料”，并在呢绒洗染厂工作。

1944年9月9日（保解放）以前，阿达纳斯·卡拉依德日耶夫在赫拉布利诺村尽头和他弟弟一起开了一个呢绒洗染厂。当他迁居普罗夫迪夫市时，他也把他的企业运来了。但是，人民会议各级组织沒有一个去查看和监督这个厂子的工作。

阿达纳斯·卡拉依德日耶夫是一个共产党员。据说，他在普罗夫迪夫市获得一批财产后，接着又获得第二批。由此，他在卡尔洛夫斯卡大街116号卖过几次东西，但仍保留着呢绒洗染厂。

（保《工人事业报》1963年8月3日刊读者来信和拉姆包夫写的评论《资产阶级道义的俘虏》的摘要）

几天之前，结束了对纺织品国民企业在布拉格齐特纳街的门市部经理雅·科拉切克的审讯。为了掩盖亏空，他曾伪造他当经理的那个门市部被人抢劫。布拉格第一区的法庭判决剝夺他十二年自由。从1955年到1962年，科拉切克盗窃了各种各样的纺织品价值

达五十二万零九百三十六克朗之多。法官审判委员会同时还判决他的十一名同犯以十年徒刑。他们大多数是纺织品国民企业其它门市部的经理，有一名领养老金者——投机商人。

解放以后，科拉切克、瓦·梅斯奈尔和弗·维塔切克一起，开设了一个出售高级纺织品的商店“雅罗维塔”。国有化以后，维塔切克逃往国外，而科拉切克和梅斯奈尔在国内是如此热心社会工作，在频繁的改组之后，他们仍然继续担任经理。

这两个人一心想捞到一个职位，在企业中如此，在社会组织中也是如此。例如梅斯奈尔积极参加布拉格第二区人民委员会的工作。科拉切克被认为是一个有魔力的人和是一名“受欢迎的工作人员”。但这一切还不足以保持他的地位。其它东西，我们将从法庭的供词中知道。纺织品企业前副经理、经济工作者斯梅扎在法庭前供认说，他每周拿科拉切克的行贿。有时他还派女秘书去为他取钱。他共得到二万一千多克朗。

法官审判委员会主席：你用什么酬谢他呢？

斯梅扎：当来“有趣的货品”时，我就让送到他店里去卖。

至于什么是“有趣的货品”，纺织品国民企业总经理沃克拉尔在审讯另一名被告——纺织品国民企业另一个门市部的前任经理弗·科马赫时，谈出来了。这指的是那些在市场上你碰不到的货品。例如当时的尼龙连袜裤等。

经理什维茨——纺织品国民企业技术发展处负责人，也属于科拉切克的朋友之列。他承认，他，纺织品企业的一个负责干部，并把自己的私人布匹放到科拉切克的商店中出售，在国营商店中私人生意兴隆起来了。

但是，如果没有领导人的“同事的好心”，就是这些有势力的人的好感也不会使科拉切克和梅斯奈尔这样长久地保持住自己的地位。例如只要他拍拍同事奥普尔萨尔的肩膀，并这样恳求道：“你是我的最好的朋友，我那里有些不妥善的事情，帮我一把好吗？”而奥普尔萨尔就会将刺从他的脚上拔掉。价值五万克朗的货品被搬到了科拉切克的商店中去。科拉切克能够把贴好封条的仓库打开，把货品在那里装上而一切会平安无事。检查员应把转货账登记下来。实际上，这种货物清点，就像儿童们做的巡回周转的游戏一样。

货品清点处，对这些事情并没有费脑筋。科拉切克与处长布拉波利尔和副处长库宾诺娃一个鼻孔出气。

他们买汽车、造别墅，情况表明，他们把所有的别墅均建成“纺织品货摊”。